

跨学科视野下的龙山时代玉器研究

中国古代以“四大发明”而著称，像“四大发明”一样为世人所知的是，中国古代有“四大土特产”——玉器、丝绸、瓷器和漆器。如若从起源与传承时间、社会功能、精神信仰等层面来看，从“四大土特产”中选择一种物质和文化来概括中国文化特质的话，那便是玉器和玉文化。

从黑龙江小南山遗址发现成批玉器的年代来看，中国的玉器与玉文化已经绵延了 9000 余年，形成了独特的玉文化。距今 5500 年至 4800 年左右，在文明化进程中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玉高峰，在东北地区有以动物造型为特征的红山玉器，在江浙地区开始形成以琮、璧、钺等为代表的良渚玉器，在中原地区出现了使用凸舌弧刃玉钺为传统的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玉器。这些地区的考古遗存，尤其是墓葬材料，皆显示出巨大的贫富和阶层分化，玉器是其中一个最重要、最有力的标志物、象征物与“奢侈品”，并被确定具备了礼制功能。同时，较多考古遗迹表明有相当一部分玉器参与祭祀活动或作为祭品，也充分体现了“玉亦神物也”^[1]。

进入广义的龙山时代，玉器在前一阶段第一次用玉高峰的基础上，继续以高昂的姿态蓬勃发展。这一阶段是玉器使用与发展的一个

[1] (清)钱培名校. 越绝书 [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7: 56.

十分重要的时期，用玉格局与用玉观念在此期间发生了较大转变，形成一系列连锁反应。玉器经过这一阶段的扩散与传播，在各个文化圈中确立了核心礼器的地位，而且用玉影响越过南岭，波及岭南，是岭南地区逐渐纳入中国版图的前奏。玉器作为史前最神圣、高贵和珍贵的物品，不是当时社会交流网络中的一般物品，而是象征着宗教和世俗权力与地位的特殊用品，还包括宇宙观、礼仪和巫术等各种当时最先进也最神秘、只有社会上层才能掌握的知识。^[1]伴随着玉器的扩散，玉器所蕴含的礼制、思想与观念随之扩散，这一时期用玉观念普遍深入人心。

之后，经过龙山时代进入夏商周三代，玉器成为等级和礼制的核心表征物质之一，及至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融入玉器，君子比德于玉，成为高雅文化的代表。从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经过龙山时代，至夏商周时期，中国古代完成了从史前社会到原史时期的转变，具体来说就是完成了从文明形成到王权国家的诞生。龙山时代也是礼的发展和礼制形成的重要时期，当时的礼和礼制与早期中国^[2]的礼和礼制又有不可分割的源流关系，它在华夏文明产生的过程中曾有过巨大的作用和辉煌的贡献。^[3]而玉器的主要功能在这一阶段也完成了从“巫玉”到“权玉”的转变，玉器的玉料来源、制作技术、纹饰系统、审美情趣也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此，考察龙山时代的用玉制度可作为窥探中国文明形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同时研究龙山时代的工艺美学则可以透视时人的技艺水准与艺术观念。通过考古、技术与艺术视角的结合，既达到“透物见人”的目的，也呈现出一种学科融合的趋势。

[1] 李新伟. 重建中国的史前基础 [M]// 北京联合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 早期中国研究·第1辑.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3: 13.

[2] 这里的早期中国特指夏商西周时期。

[3] 杨群. 从考古发现看礼和礼制的起源与发展 [J]. 孔子研究, 1990 (3): 3-11.

一、龙山时代玉器研究的范式

(一) 金石学范式

自北宋金石学开创以来,中国古玉研究已有千余年的历史。虽然聂崇义《新定三礼图》不是著录古玉的开始,也非专门的金石学著作,而且书中对古代玉器使用的方法和制度的认识也未必完全正确,但是其中对牙璋、玉钺的记载与使用说明,算是目前所见最早有关龙山时代玉器的论述,并有图可考。其后,北宋著名金石学家吕大临著《考古图》,其中第八卷著录玉器,虽然书中所录玉器没有确切的龙山时代玉器,但却是收集、著录中国古玉的肇始之作。在此之后的两宋时期,也陆续有几部收录古玉的书籍,如李公麟的《周鉴图》(可惜后来失传)、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至元代,出现了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著录玉器的专著——朱德润《古玉图》,并较为详细地论述了如何鉴赏玉器。元代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一书中有相关用玉的记载等。这些书中均少量涉及龙山时代玉器。

至清代,金石学之风大为盛行,对古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前朝各代,其中著录和研究古玉的代表作即为吴大澂的《古玉图考》。该书成书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收录吴大澂自家及友人所藏古玉近200件,均有附图,图由吴大澂族弟吴大楨精心绘制。器物种类繁多,每一类玉器多少不等,其后按类附有器物尺寸、名称、用途、年代的文字说明及考释,字数亦有多寡,是一本文图并茂、对研究中国古代玉器有较高参考价值的著作。^[1]书中著录的相当一部分玉璧、牙璋(书中称之为璿玠和夷玉)、牙璧、玉琮、玉璜等,从器物形制来看,可以追溯至龙山时代,甚至更早。其中一些考释未必正确,但亦是有益的探索,且其中某些可能为龙山时期的玉器,成为了后来古玉研究的热门争论,如《古玉

[1] 安然. 略论吴大澂的传古之功 [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07.

图考》第五十页中著录的一件所谓的“璿玕”，转卖到芝加哥费氏自然史博物馆（Field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Chicago），此器为20世纪“璇玕论战”的主角。^[1]此外，徐寿基的《玉谱类编》是一部较为系统的玉器专著，全书四卷二十八集，遍查古籍，分类编排。其中卷一：释名、出产、形质、色泽、精神、典故、符瑞、灵异、珍奇；卷二：天文、岁时、地理、人事、人品、身体；卷三：辑瑞、礼器、乐器、器用、文具、武备；卷四：闺阁、宫室、服饰、饮食、像生、草木、玩古。该书内容丰富，旁征博引，其中部分内容的考证和认识是与龙山时代玉器相联系的。

现代以来，以那志良所编《古玉图籍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编《古玉考释鉴赏丛编》和桑行之编《说玉》等3本书最为重要，但大多属于资料汇编性质，且涉及玉器多为历史时期古玉，与龙山时代玉器没有太大关联。

综上所述，金石学传统之下的古玉研究主要集中在收藏玉器的著录，主要包括古玉的名称、尺寸、纹饰、线图描绘等。在此基础上，结合儒家经、史类文献，对这些玉器的功能、使用场合、社会意义进行阐发。至19世纪末，开始具有系统性思维，基于历史文献进行系统的玉器研究和相关文献与图谱的汇集。然而，这一时期缺少考古发掘品，更多地停留在对玉器的描述、文献的探讨和资料的汇编上，新解不多，难以超脱传统学术范式的桎梏。

（二）考古学范式

自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诞生以来，考古发掘出土的玉器数量迅速增长。面对众多的精美古玉，传统的金石学方法已不能满足龙山时代玉器研究的需要，而考古学的方法和理论则为龙山时代的玉器研究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力量，产生了大量考古学研究范式的研究。纵观已有研

[1] 邓淑革. 百年来古玉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C]// 载庆祝高去寻先生八秩荣庆论文集. 台北：正中书局，1991：233-276；邓淑革. 《古玉图考》导读 [M]. 台北：艺术图书公司，1992：41-49.

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综论

自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发现并确认后，大量的红山和良渚玉器涌现出来。红山文化中形象生动的动物造型玉器和良渚文化中数量丰富的琮、璧、钺及精美神秘的“神徽”图案，不仅让学界震惊，更让学者欣喜，让人们认识到中国远古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发达。加之，史前其他不同时期、不同考古学文化也发现了或多或少的玉器，因此史前玉器的文化面貌成为学者考察和研究的对象之一，而龙山时代玉器自然便在其中之列。

在这方面着墨较早较多的是杨晶，1993年她发表了《中国史前玉器概述》^[1]一文，将中国史前玉器分布区划分为六大区、两大系统，又将史前玉器以距今5500年为分界划分为两大阶段。该文是其后出版的《中国史前玉器的考古学探索》一书的浓缩版。在该文中重点对中国史前最具代表性的两个地区的玉器系统，即西辽河系统和环太湖系统，按照时间脉络作了较为详尽的梳理，总结出各自的用玉类别和特点。^[2]文章以玦、璜、钺、琮等4种史前最主要的玉器为中心，每类分地域进行详尽的梳理，指出其最早发生地，总结出每个区域的发展脉络及其使用情况、功能等，以及可能的传播或影响区域和路径。文章的最后对中国史前玉器格局和流源进行了综述，这也是概述最出彩的地方，作者根据苏秉琦先生的六大区系的划分，也将中国史前玉器划分为六大区，即以西辽河流域为中心的东北地区、黄河中上游地区、黄河下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和东南地区。关于此类对中国史前玉器进行分区或划分板块、起源类型、整体概况进行研究的还有杨伯达^[3]、黄宣佩^[4]、

[1] 杨晶. 中国史前玉器概述 [J]. 华夏考古, 1993 (3): 88-93.

[2] 杨晶. 中国史前玉器的考古学探索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3] 杨伯达. 琄珩琪考 [J]. 北方文物, 2002 (2): 1-5; 杨伯达. 中国史前玉文化板块论 [M]// 杨伯达. 巫玉之光: 中国史前玉文化论考.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71-86.

[4] 黄宣佩. 略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玉器 [C]// 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集刊 (4).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150-170.

郭大顺^[1]、邓淑苹^[2]、黄翠梅^[3]、牟永抗^[4]、曲石^[5]、孔德安^[6]、任式楠^[7]、张绪球^[8]、邵望平和高广仁^[9]、赵葦^[10]等。

由于史前所涵盖的时间悠长，除了个别学者的论著对整个史前玉器梳理的相对较为全面和细致外，大部分研究多是整体性的描述和概括，并没有深入逐个时代、逐个地域梳理。即便是较为详细者，也是有所侧重。整体来讲，目前仍缺乏系统性的龙山时代玉器研究。

2. 区域性研究

由于龙山时代玉器集中出土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地域范围之内，因此，对不同地区、不同考古学文化玉器的研究成为龙山时代玉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是对某一考古学文化玉器的研究，如张绪球^[11]、院文清^[12]、杨建芳^[13]、王劲^[14]、林巳奈夫^[15]、吴桂兵^[16]、陈茜^[17]等对石家河文化

[1] 郭大顺. 史前玉器分区研究的启示 [C]// 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 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394-406.

[2] 邓淑苹. 中国古代玉器文化三源论 [J]. 中华文化学会，1995 年刊.

[3] 黄翠梅. 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文化谱系初探 [J]. 史评集刊，2002（1）：6-16.

[4] 牟永抗. 中国史前古玉概论 [C]// 刘国祥，邓聪. 玉根国脉：2011“岫岩玉与中国玉文化学术研讨会”文集.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271-295.

[5] 曲石. 古代玉器的起源和发展 [J]. 文博，1987（3）：73-76.

[6] 孔德安. 论我国新石器时代的玉器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学集刊·12.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148-193.

[7] 任式楠. 中国史前玉器类型初析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论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 40 周年纪念.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3：106-130.

[8] 张绪球. 中国史前玉器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C]// 费孝通. 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58-65.

[9] 邵望平，高广仁. 关于中国古代玉文化的几点思考 [C]// 费孝通. 玉魄国魂：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45-57.

[10] 赵葦. 新石器时代中国玉文化的区域差异与特征 [D]. 郑州：郑州大学历史学院，2010.

[11] 张绪球. 石家河文化的玉器 [J]. 江汉考古，1992（1）：56-60.

[12] 院文清. 石家河文化玉器概论 [J]. 故宫文物月刊，1997（173）.

[13] 杨建芳. 石家河文化玉器及其相关问题 [J]. 故宫学术季刊，1991（4）.

[14] 王劲. 石家河文化玉器与汉江文明 [C]//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暨第二届亚洲文明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长沙：岳麓书社，1996：231-242.

[15] 林巳奈夫. 关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 [C]// 邓聪. 东亚玉器·I. 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1998：287-297.

[16] 吴桂兵. 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区域功能与普遍影响 [J]. 中原文物，2002（5）：30-36.

[17] 陈茜. 石家河文化玉器研究 [D]. 长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2017.

玉器的研究，另有荆州博物馆编著《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图录^[1]；杨伯达^[2]、黄宣佩^[3]、叶茂林^[4]、杨美莉^[5]、谢晓燕^[6]、王玉妹^[7]、郭金钰^[8]、王裕昌^[9]等对齐家文化玉器的研究，另有《齐家古玉》^[10]这类著录与介绍性质的编著；高炜、乔杨^[11]对陶寺玉器的研究^[12]等。

其次，是对某一地区或几个地区史前玉器的整体性研究，如赵春青^[13]、曹桂岑^[14]对中原地区史前玉器的梳理和分期；张敬国对安徽史前玉器的研究^[15]；栾丰实^[16]对晋南地区史前玉器的研究；周南泉^[17]、杨晶^[18]、

[1] 荆州博物馆. 石家河文化玉器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2] 杨伯达. 甘肃齐家文化玉器初探: 记鉴定全国一级文物所见甘肃古玉 [J]. 陇右文博, 1997 (1), 又见《巫玉之光》, 2005: 170-181.

[3] 黄宣佩. 齐家文化玉礼器 [C]// 邓聪. 东亚玉器·I.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 184-191.

[4] 叶茂林. 齐家文化玉器的几个问题 [C]//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创建四十周年暨冯汉骥教授百年诞辰纪念文集.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1: 190-194; 叶茂林. 齐家文化玉石器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考古求知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251-261; 叶茂林. 从青海喇家遗址出土资料再论齐家文化玉器 [C]// 钱宪和. 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 中国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印行, 2001: 397-404.

[5] 杨美莉. 齐家文化玉器的性质与特色 [J]. 淡江史学, 2000 (11); 杨美莉. 齐家文化的玉围圈 [J]. 故宫文物月刊, 2000 (207).

[6] 谢晓燕. 齐家文化玉器的发展与演变 [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11 (3): 104-109.

[7] 王玉妹. 齐家文化玉器的考古学研究 [D]. 长春: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12.

[8] 郭金钰. 齐家文化玉石器研究 [D].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2.

[9] 王裕昌. 齐家文化玉器散论 [J]. 博物馆研究, 2012 (4): 63-78.

[10] 彭燕凝, 仁厚. 齐家古玉 [M].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05.

[11] 乔杨. 陶寺文化玉器研究 [D]. 长沙: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2018.

[12] 高炜. 陶寺文化玉器及相关问题 [C]// 邓聪. 东亚玉器·I.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 192-200.

[13] 赵春青. 试论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分期 [C]// 杨伯达. 中国玉学玉文化论丛三编·上.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5: 279-319.

[14] 曹桂岑. 河南史前玉器 [C]// 钱宪和. 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 中国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印行, 2001: 115-128.

[15] 张敬国. 安徽新石器时代出土玉器研究 [C]//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安徽省考古学会. 文物研究 (第11辑). 合肥: 黄山书社, 1998: 2-18.

[16] 栾丰实. 简论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玉器 [J]. 文物, 2010 (3): 37-45; 栾丰实. 试论陕北和晋南的龙山时代玉器: 以石峁、碧村和陶寺为例 [J]. 中原文物, 2021 (2): 80-91.

[17] 周南泉. 试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 [J]. 考古与文物, 1985 (5): 80.

[18] 杨晶. 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玉器研究 [J]. 东南文化, 1994 (4): 37: 48.

肖梦龙^[1]、殷志强^[2]、田名利^[3]等分别对长江下游地区史前玉器的研究，张绪球^[4]、何介钧^[5]等对长江中游地区史前玉器的研究，还有吴桂兵和季海群^[6]对整个长江流域的龙山时代玉器进行概述；雍颖^[7]、邵望平^[8]、高广仁^[9]、何德亮^[10]、逢振镐^[11]、孙妍^[12]、张美玲^[13]、张卫英^[14]、杨凡^[15]等对海岱地区（山东地区）史前玉器的研究；孙长庆、殷德明、干志耿^[16]、于建华^[17]、周晓晶^[18]、赵宾福^[19]、孙守道^[20]、

-
- [1] 肖梦龙. 长江下游史前玉器概论 [J]. 南方文物, 2005 (1): 35-53.
- [2] 殷志强. 太湖地区史前玉器述略 [J]. 史前研究, 1986 (Z2): 143-154.
- [3] 田名利. 宁镇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简论 [C]// 杨建芳师生古玉研究会. 玉文化论丛 2. 北京: 文物出版社, 台北: 众志美术出版社, 2009: 182-192.
- [4] 张绪球. 长江中游新石器时代玉器 [C]// 邓聪. 东亚玉器·I.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 216-221.
- [5] 何介钧. 湖南史前玉器 [C]// 邓聪. 东亚玉器·I.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 222-227.
- [6] 吴桂兵, 季海群. 长江流域龙山时代玉器概述 [C]// 翁明礼, 姚伟民. 长江文化论丛第二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2.
- [7] 雍颖. 海岱地区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 [J]. 故宫学术季刊, 1999, 17 (4); 雍颖. 试探山东地区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分期与特征 [J]. 辽海文物学刊, 1996 (2): 101-112.
- [8] 邵望平. 海岱系古玉略说 [C]//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论丛: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建所 40 周年纪念.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3: 131-141.
- [9] 邵望平, 高广仁. 海岱系玉文化的流变 [C]// 钱宪和. 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论文集专辑. 中国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印行, 2001: 313-320.
- [10] 何德亮. 山东史前玉器及相关问题探讨 [J]. 东方博物, 2007 (1): 18-25.
- [11] 逢振镐. 史前东夷出土玉器分析与玉制造业的发展 [J]. 北方文物, 1998 (4): 18-24.
- [12] 孙妍. 大汶口文化玉器研究 [D]. 长春: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07.
- [13] 张美玲. 山东地区出土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 以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玉器为中心 [D]. 烟台: 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 2013.
- [14] 张卫英. 山东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综论 [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3.
- [15] 杨凡. 海岱地区史前玉器初探 [D]. 济南: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6.
- [16] 孙长庆, 殷德明, 干志耿. 黑龙江新石器时代玉器概论 [C]// 邓聪. 东亚玉器·I.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 120-127.
- [17] 于建华. 黑龙江省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玉器及相关问题 [J]. 北方文物, 1992 (4): 11-18.
- [18] 周晓晶. 吉黑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探究 [J]. 北方文物, 2000 (4): 1-6; 周晓晶. 辽东半岛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初步研究 [J]. 北方文物, 1999 (1): 18-24.
- [19] 赵宾福. 吉林省出土的史前玉器及相关问题 [C]// 邓聪. 东亚玉器·I.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 164-170; 赵宾福. 关于辽西史前玉器的几个问题 [C]// 张忠培, 徐光冀. 玉魄国魂: 中国古代玉器与传统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北京: 燕山出版社, 2002: 135-148.
- [20] 孙守道. 中国史前东北玉文化试论 [C]// 邓聪. 东亚玉器·I.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 102-119.

刘国祥^[1]、王玉华^[2]、康波^[3]、吴丽丹^[4]、李陈奇^[5]、冈村秀典^[6]、中山清隆^[7]、任妮娜^[8]、刘特特^[9]、王玉华^[10]等对燕辽及东北地区史前玉器的研究；闫亚林^[11]、叶茂林^[12]、杨晓明^[13]等对西北地区史前玉器的研究；杨亚长^[14]、权敏^[15]、张锬^[16]、张锋钧^[17]对陕西史前玉器的研究；杨式挺^[18]、李岩^[19]对广东史前玉器的研究，肖一亭对岭南史前玉器的研究^[20]，张宗亚对华南地区史前玉器的研究^[21]；邓淑苹对华西系统玉器的探讨^[22]等。

再者，是对某一龙山时代遗址或墓地出土玉器的研究，如马金花对

-
- [1] 刘国祥. 黑龙江史前玉器研究 [J]. 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2000 (1): 72-86; 刘国祥. 辽西古玉研究综述 [J]. 故宫博物院院刊. 2000 (5): 6-20; 刘国祥. 吉林史前玉器试探 [J]. 北方文物, 2001 (4): 6-16.
- [2] 王玉华. 东北地区史前玉器研究: 以辽西地区为中心 [D]. 沈阳: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2008.
- [3] 康波. 黑龙江出土史前玉器初步研究 [D]. 长春: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05.
- [4] 吴丽丹. 论东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的四个发展阶段 [D]. 长春: 吉林大学文学院, 2007.
- [5] 李陈奇, 赵晋春. 黑龙江古代玉器 [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8.
- [6] 冈村秀典. 辽东新石器时代的玉器 [C]// 钱宪和. 海峡两岸古玉学会会议论文集. 中国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印行, 2001: 391-396.
- [7] 中山清隆. 中国东北地区的史前玉器: 以黑龙江省的资料为中心 [J]. 博物馆研究, 2001 (3).
- [8] 任妮娜. 环渤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 [D]. 沈阳: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2013.
- [9] 刘特特. 辽西古文化区史前玉器研究 [D]. 沈阳: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2012.
- [10] 王玉华. 东北地区史前玉器研究: 以辽西地区为中心 [D]. 沈阳: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2008.
- [11] 闫亚林. 西北地区史前玉器研究 [D]. 北京: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2010.
- [12] 叶茂林. 黄河上游新石器时代玉器初步研究 // 邓聪. 东亚玉器·I.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 180-183.
- [13] 杨晓明. 甘青地区史前玉器研究 [D]. 兰州: 西北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2014.
- [14] 杨亚长. 陕西史前玉器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J]. 考古与文物, 2001 (6): 46-52.
- [15] 权敏. 陕西龙山时代至夏时期玉器的初步研究 [D]. 西安: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2010.
- [16] 张锬. 论陕北地区发现的玉器 [J]. 文物世界, 2012 (2): 15-21.
- [17] 张锋钧. 西安地区出土玉器述要 [J]. 中原文物, 2011 (3): 76-84.
- [18] 杨式挺. 广东史前五石器初探 [C]// 邓聪. 东亚玉器·I.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 304-315.
- [19] 李岩. 广东地区文明进程的玉器传播与使用浅见 [C]// 杨伯达. 中国玉文化论丛四编·下.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7: 329-334.
- [20] 肖一亭. 岭南史前五玉器的初步研究 [J]. 南方文物, 1998 (4): 55-63.
- [21] 张宗亚. 华南地区史前五石器初探 [D].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 2013.
- [22] 邓淑苹. 也谈华西系统的玉器 (一至六). 故宫文物月刊, 1993 (125-130); 邓淑苹. “华西系统玉器”观点形成与研究展望 [J]. 故宫学术季刊, 2007, 25 (2).

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的研究；^[1]戴应新^[2]、王炜林^[3]、孙周勇^[4]、姬乃军^[5]等对神木石峁、神木新华和延安芦山峁遗址出土玉器的研究；王劲对肖家屋脊遗址出土玉器的瓮棺葬的研究；^[6]韩榕对临朐西朱封龙山大墓出土玉器及相关问题的探讨。^[7]

区域性研究多为通过梳理一个考古学文化、一个区域或一个遗址的玉器后，进行分期或发展阶段划分，然后总结其器类特征、时代特征和使用特征，有些涉及不同区域或考古学文化的交流。这一方面的研究多为实际参与龙山时代田野考古发掘的各地考古工作者，因此带有较强的资料性。一方面可以看出，对某一考古学文化或某一地域的史前玉器研究较多，缺乏大范围内的整体性研究和对比研究，而且这些研究多侧重考古发现和时代分析。另一方面则是对玉器各个方面的研究都有所涉及，暂且称之为“通盘式”的研究，但正是由于兼顾各个方面，从而导致无法深入细致地分析。再者，缺乏在不同考古背景层次下的用玉传统研究，而这就凸显出另外一个问题，即用玉传统研究要求考察的主体除玉器外，还要兼顾考察其他与玉器功能相似而质地不同的器物，这样才能更加显现出玉器的特点和在器物群中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还可以窥探时人的用玉观念与喜好。然而，以往的研究大多只关注玉器本身，可被称为“器物本位”。

3. 玉器专题研究

龙山时代发现玉器的数量和使用规模虽然与红山和良渚文化玉器无法相比，但是一些特定器类因关系到文明发展、国家与礼制形成及某些

[1] 马金花. 山西芮城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浅说[J]. 文物世界, 2009(3): 3-7.

[2] 戴应新. 我与石峁龙山文化玉器[C]// 杨伯达.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4: 228-239.

[3] 王炜林, 孙周勇. 石峁玉器的年代及相关问题[J]. 考古与文物, 2011(4): 40-49.

[4] 孙周勇. 神木新华遗址出土玉器的几个问题[J]. 中原文物, 2002(4): 37-42.

[5] 姬乃军. 延安市芦山峁出土玉器有关问题探讨[J]. 考古与文物, 1995(1): 23-29.

[6] 王劲. 肖家屋脊遗址玉器瓮棺葬者探讨[C]// 陕西省文物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 祝贺石兴邦先生考古半世纪暨八秩华诞文集.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3: 407-416.

[7] 韩榕. 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墓葬出土玉器及相关问题[C]// 邓聪. 东亚玉器·I.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 201-207.

玉器本身的源流，因而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和焦点之一。这些器类主要有牙璋、牙璧、西朱封冠饰^[1]、石家河人头像^[2]、齐家文化的玉琮和玉璧^[3]等。其中，由于牙璋出土范围大、时代跨越史前与国家产生，同时被认为承载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礼制的传承与发展，因而成为学者讨论最多的器类，讨论内容涉及其起源与演变、分类与定命、用途与传播等，以试图廓清牙璋研究迷雾，然而由于文献记载寥寥，且具有明确出土背景的牙璋数量不多，所以这些讨论仍然歧见纷呈，没有定论。^[4]对牙璧的关注与讨论虽不如牙璋多，但扑朔迷离的局面与牙璋所面临的处境相同，^[5]栾丰实的《牙璧研究》收集资料全面，^[6]论述涉及牙璧研究的各个方面，是一篇较有影响的文章。此外，尚有杨伯达^[7]、安志敏^[8]、周南泉^[9]、王嗣洲^[10]、刘俊勇^[11]等对牙璧进行过相关研究。另外，近年来开始出现独立

[1] 杜金鹏. 论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玉冠饰及相关问题[J]. 考古, 1994(1): 55-65.

[2] 杜金鹏. 石家河文化玉雕神像浅说[J]. 江汉考古, 1993(3): 51-59; 袁士京, 陈震. 三星堆青铜头像和石家河玉面人像: 从三星堆青铜头像看三星堆文化的来源[J]. 成都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1(1): 41-43; 常素霞. 人物神灵玉器浅议[C]// 杨伯达.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4: 320-331.

[3] 王裕昌. 甘、青、宁博物馆馆藏齐家文化玉琮、玉璧研究[J]. 丝绸之路, 2011(12): 5-11.

[4] 对考古出土资料收集较完备的有王永波的《耜形端刃器的分类与分期》; 对流散在世界各地博物馆牙璋资料收集较为完备的有林巴奈夫的《中国古代的石刀形玉器和骨铲形玉器》, 已收入林巴奈夫著、杨美莉译《中国古玉研究》一书。此外,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考古艺术中心编《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活动六十周年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4年)则是以牙璋为主要论题的论文集, 收录各家意见较为完备。2016年10月再次召开专门的牙璋学术研讨会, 会后出版有牙璋图录和一部分会议论文。另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牙璋的文章, 但多与夏商文化交流及传播有关, 在此不一一列举。

[5] 夏鼐. 所谓玉璠玕不会是天文仪器[J]. 考古学报, 1984(4): 403-412; 陆思贤. 新石器时代原始先民对“机械运动”的认识: 论“璠玕”[J]. 内蒙古师大学报: 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6(3): 36-41; 曲石. 为璠玕正名[J]. 文博, 1988(5): 28-33; 殷志强. 略说齿牙形玉器[J]. 华夏考古, 1990(3): 109-112; 任妮娜. 史前玉器牙璧之用途说[J]. 文史月刊, 2013(3): 20-21.

[6] 栾丰实. 牙璧研究[J]. 文物, 2005(7): 69-81.

[7] 杨伯达. 巫玉之光续集[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11: 93-136, 252-266, 477-502.

[8] 安志敏. 牙璧试析[C]// 邓聪. 东亚玉器·I. 香港: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 1998: 37-44.

[9] 周南泉. 神秘的玉旋涡形器: 论所谓的“璠玕玉衡”及其用途[J]. 故宫文物月刊, 1992(116).

[10] 王嗣洲. 璠玕·辽东半岛与山东半岛之比较[C]// 旅顺博物馆. 旅顺博物馆学苑.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8: 31-38.

[11] 刘俊勇. 辽东半岛牙璧初步研究[C]// 杨伯达.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下.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5: 364-371.

探讨非上述所提的玉礼器，而是装饰作用的环饰和其他装饰品。^[1]长期以来，装饰品往往被纳入服饰文化的分析，鲜有将其作为独立的文化来研究，这类研究的尝试也许可以说明装饰品本来具有的特殊性和独立研究的必要，^[2]将其从服装史研究中独立出来，也标志着对该领域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而其他器类的研究多与制玉工艺、文化交流有关，本文会多有引用，在此不再赘述。

4. 玉器所反映的精神内涵与礼制

虽然龙山时代所处的史前末期尚未形成成熟的文字体系，文献的记载也寥寥无几，但因玉器在夏商周三代礼制中所占据的重要而又特殊的地位和中国文明与文化的一脉传承性，学界一致认为史前玉器，尤其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龙山时代的玉器便已蕴含一定的精神内涵与礼制。如同三代玉器多出自墓葬一样，龙山时代甚至是整个史前时期，玉器亦多出自墓葬之中，因而很多学者关注这些墓葬之中玉器的功能与其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与礼制。

首先，是史前玉器的功能，观点多样多彩，有神灵食品说^[3]、巫师的通神工具^[4]、灵物^[5]、神物^[6]、占卜工具^[7]、财富等。其次，是史前玉器所蕴含的精神内涵与礼制。一是认为史前玉器与巫术关系密切，^[8]在琢制的过程中已赋予了巫术的含义，具有浓厚的宗教意味；二是认为史前玉器是象

[1] 秦小丽. 中国古代装饰品研究：新石器时代—早期青铜时代 [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 秦小丽. 新石器时代环形饰品研究 [J]. 考古学报，2011（2）：151-182.

[3] 臧振. 古玉功能辨析：玉为神灵食品说 [C]// 杨伯达.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1-22.

[4] 张得水. 史前巫与玉关系之探讨 [C]// 杨伯达.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308-331.

[5] 所谓“灵物”，实质上是超自然力（灵性）及其载体（灵体、灵魂）观念的物化形态，也是人们与超自然力交往的必要物质媒介和实物手段，是概括的形象思维。

[6] 杨伯达先生在其《巫玉之光》一书中多有论述。

[7] 张得水，李丽娜. 中国史前的骨卜、龟卜和玉卜 [C]// 杨伯达.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上.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5：31-48.

[8] 张得水. 史前玉与巫关系之探讨 [C]// 杨伯达.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308-319.

征等级和权力的礼器，被赋予了礼制的含义。^[1]再次，从文明化进程的视角来看待玉器的独特作用。史前玉器不仅是精神文明进程的标志，^[2]而且是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3]

然而，上述研究多为单篇论述，因而也决定了其研究仅是从整体与宏观层面上的概述，没有具体微观考察和分析的支撑。不过，这些研究为今后龙山时代玉器社会功能的深入探索指明了方向。

5. 玉器的科技考古研究

龙山时代玉料的来源与产地是玉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关系到先民对自然资源开发和利用的程度，以及不同区域之间物产资源的交流与互换。对整个史前时期玉器的来源与产地进行过探讨和研究的学者有栾秉璈^[4]、谭力平与钱宪和^[5]。还有些学者仅对某一地区、某一考古学文化、某一遗址、某一类玉石的来源与产地进行过研究，如赵朝洪等对辽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原料产地的初步探讨；^[6]王强对海岱地区史前玉料的来源与琢玉工艺的考察；^[7]周述蓉、钱宪和对齐家文化玉器的玉质、次生变化及工艺制作技术的分析；^[8]吴小红、赵朝洪等对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

[1] 何宏波. 史前玉礼的形成和初步发展 [M]// 杨伯达.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4: 83-108.

[2] 王国道, 崔兆年. 青海齐家文化玉器研究 [C]// 杨伯达.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续编.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4: 240-265; 吴汝祚. 海峡两岸史前时期玉器中心地区的形成和其社会意义 [C]// 钱宪和. 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 中国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印行, 2001: 10-53.

[3] 张得水. 史前玉礼器的起源与发展 [J]. 东南文化, 2000 (11): 93-99; 孔德安. 试论玉器在中华文明形成中的作用 [C]// 杨伯达.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下.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5: 559-567; 郑光. 浅谈中国玉器文化与上古文明 [C]// 钱宪和. 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 中国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印行, 2001: 1-10.

[4] 栾秉璈. 史前古玉玉质及玉料来源之探讨 [C]// 杨伯达.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下.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5: 620-629.

[5] 谭力平, 钱宪和. 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的某些物理与化学特征初步研究 [C]// 钱宪和. 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集. 中国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印行, 2001: 501-510.

[6] 赵朝洪, 等. 辽海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原料产地的初步探讨 [C]// 杨伯达. 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下.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05: 630-643.

[7] 王强. 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玉料来源及琢玉工艺初探 [J]. 华夏考古, 2008 (2): 76-83.

[8] 周述蓉, 钱宪和, 等. 从齐家文化玉器的玉质、次生变化及工艺制作技术看齐家文化的玉文化与科学技术 [C]// 中国台北: “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印, 2001: 405-420.

文化晚期玉器产地的初步分析；^[1] 栾秉璈对史前绿松石出土的分布特征及原料来源问题的梳理。^[2]

玉器产地的溯源需要借助科技手段，因而科技考古从业者和地质学者通过各种科技手段对古玉的硬度、化学成分进行分析，主要是全岩石分析、金属元素分析和稀土等元素分析三类，以考察史前不同遗址出土古玉的物理和化学特性，揭示其成因和判断古玉料的来源问题。^[3] 在此方面所做工作较多的是地质学者，如中国台湾大学地质系 1996 年在钱宪和教授的主持下编纂了《古玉之矿物研究专辑》，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闻广研究员也在此方面着力较多。与此同时，也可检验不同仪器在此方面的研究作用。^[4] 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虽然已经大有进展，特别是针对诸如红山^[5]、良渚^[6]、凌家滩^[7]等文化玉器在此方面的工作尤多，但是对于龙山时代玉器的这方面研究则为数寥寥。

古玉在时间的洗礼下，经过地下埋藏环境漫长的侵扰，会致使其发生一定的次生变化，如良渚反山与瑶山墓地出土的绝大部分玉器表面因受沁而白化，呈现鸡骨白色。在此方面，主要关注史前时代玉器的受沁与白化机理的研究，较为深入、系统的探索是王荣的博士论文《古玉器

[1] 吴小红，赵朝洪．肖家屋脊遗址石家河文化晚期玉器玉料产地初步分析[C]//钱宪和．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中国台北：“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印行，2001：557-562.

[2] 栾秉璈．古代绿松石释名、史前出土物分布特征及原料来源问题[C]//钱宪和．海峡两岸古玉学会议论文专辑．中国台北：“国立台湾大学”理学院地质科学系印行，2001：531-536.

[3] 张朱武，干福熹，承焕生．不同成矿机理和地质环境下形成的软玉的化学成分特征[J]．矿物学报，2010（3）：367-372；伏修峰，干福熹，马波，等．几种不同产地软玉的岩相结构和无损成分分析[J]．岩石学报，2007（5）：1197-1202.

[4] 王荣，冯敏，吴卫红，等．拉曼光谱在薛家岗古玉测试分析中的应用[J]．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05（9）：1422-1425；赵虹霞，干福熹．拉曼光谱技术在中国古玉、古玉器鉴定和研究中的应用[J]．光谱学与光谱分析，2009（11）：2989-2993；王时麒，賈雪梅．论同位素方法在判别古玉器玉料产地来源中的应用[C]//北京中国地质大学．首届“地球科学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暨地质学史专业委员会第17届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中国地质学会，2005：222-230；张朱武，承焕生，干福熹．玉石与中国古代玉器的PIXE分析[J]．核技术，2009，32（11）：833-839.

[5] 刘志勇，干福熹，承焕生，等．蛇纹石质古玉器的无损分析研究[J]．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3）：370-377；王时麒．岫岩软玉与红山文化[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4（3）：40-43.

[6] 程军，等．良渚文化玉器的稀土元素特征及其考古学意义[J]．稀土，2000，21（4）：1-4.

[7] 朱勤文，张敬国．安徽凌家滩出土古玉器软玉的化学成分特征[J]．宝石和宝石学杂志，2002，4（2）：18-21.

受沁机理初探》，表明古玉的风化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失”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得”的过程。

相对于其他方面，龙山时代玉器制作工艺的研究相对较少。吴棠海是较早对龙山时代玉器工艺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从20世纪90年代在北京大学上课的讲义开始，一直在不断完善，目前集大成于其《中国古代玉器》一书。^[1]钱宪和、方建能编有《史前琢玉工艺技术》，故宫博物院徐琳女士在此方面也致力较多，著有专著，^[2]不过他们并没有专辟一章讨论龙山时代的治玉工艺，而是将其置于整个史前玉器工艺之中。近年来，也有学位论文专注于中国古代治玉技术，讨论的年代和内容都较为全面。^[3]叶晓红女士则在个案研究方面投入较多。与其他研究者多从肉眼观察不同，叶晓红采用硅胶翻模、电子显微放大、特定软件分析等科技手段，在玉器制作工艺的定量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开拓性。玉器的材质与工艺不仅是玉器考古研究范式的内容，也是玉器工艺美术研究的重要构成。对于龙山时代玉器而言，材质和工艺研究需要借助科技手段，才能获取尽可能多的信息。

（三）艺术学范式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玉的定义就是“石之美者也”，因而“美”是玉的天然属性之一。中国玉器与玉文化自诞生以来，连绵不绝地传承至今。在晚清至20世纪初期，玉器开始被海外的收藏家所关注，并被视为古代中国的重要艺术品，这一传统被海外的博物馆收藏与学术研究所继承。早在1887年，曾担任法国驻华使馆秘书的莫里斯·巴雷欧娄格（Maurice Paléologue, 1859—1944）出版了法国第一本关于中国美术的综合性著作《中国艺术》（*L' Art Chinois*），大致将中国艺术品分为9类，包括青铜器、建筑、石雕、竹木牙角雕刻、玉器、陶瓷、玻璃器、珉琅

[1] 吴棠海. 中国古代玉器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2.

[2] 徐琳. 中国古代治玉工艺 [M]. 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 2011.

[3] 孔富安. 中国古代制玉技术研究 [D]. 太原: 山西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 2007.

器和漆器。后来，英国学者卜士礼（Stephen Wootton Bushell，1844—1908）在巴雷欧娄格的基础上将中国艺术品进一步细分为12类。虽然反响平平，但是卜士礼在 *Chinese Art* 一书的前言中仍然赞誉此书为法文世界的中国美术工艺类书籍中“最善本”^[1]，同时，于20世纪初出版的 *Chinese Art* 是第一本英文中国艺术通论，书中不乏对中国工艺美术品类的著述，其中就包含玉器。这一艺术分类传统被西方学者所继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多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1967年韩斯福（S. Howard Hansford，1899—1973）教授应邀整理欧特赞（Klaus D. Baron von Oertzen，1894—1991）藏玉，并出版图录《玉：精神见于山川》。韩斯福教授在书中对这批玉器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欧特赞藏玉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藏玉之一，不仅在于藏玉的数量、质量和涉及的时代，更重要的是它所代表的玉器的造型和工艺，从新石器时代到19世纪中期，几千年来绵延不绝，尤其是距今2000多年的东周时期洛阳金村玉器，其优美的造型及高超的琢制工艺，可以与欧美所藏的任何玉器媲美”。^[2]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学者是杰西卡·罗森（Jessica Rawson，1943—），她从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关注和从事中国艺术研究，1995年出版了关于中国玉器的专著 *Chinese jade from the Neolithic to the Qing*（London: British Museum Press），也是一本较为系统性的著录和研究。在之后的研究中，罗森也持续关注中国玉器及其研究。

当代中国，在学科与学术层面上，玉器仍被视为重要的工艺美术，其发展与传承的历史是工艺美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在20世纪80年代涌现出的第一部中国工艺美术通史著作——《中国工艺美术史》中，关于玉器的工艺美学研究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在工艺美术的教学中，玉文化研究与玉器创作是其中的一个有机单元。同时，这一时期

[1] 汪燕翎. 汉学视阈中的中国美术：卜士礼与他的“Chinese Art”[J].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5（5）：10-14.

[2] S. Howard Hansford. Jade: Essence of Hills and Streams[M]. New York: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 1968.

田自秉先生也系统地提出了工艺美学的概念，并希望由此建立一个工艺美学学科。^[1]然而，由于传统工艺美术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式微，加之此时在高等教育的学科体系中，“艺术设计”取代了“工艺美术”，因而 21 世纪之前，并没有建立起玉器研究的艺术学范式。

进入 21 世纪后，国家逐渐重视传统文化与传统工艺的保护与传承，故而传统的工艺美术研究逐渐复兴。在创作与产业层面，玉器与玉雕也仍然被视为一类具有民族特质的工艺美术品和产业，备受重视。因而，艺术院校史论专业的学者与研究生开始关注玉器的艺术特征、设计原则与美学思想。这类研究以考古材料为出发点，从艺术史和设计史的视角，通过图像学方法、风格分析、制作工艺等对古代玉器加以专题或系统研究，建立其艺术特征谱系，构建其审美倾向，发掘其工艺美学。这种艺术学范式为玉器的研究注入了艺术性、审美性解读，增添了新的研究视角。目前，关于龙山时代玉器的艺术学范式的代表性研究有李艳红《中国史前装饰品的造型和分区分期研究》、李晶晶《长江中下游史前玉器的审美特征》、段敬译《玉器：神话、艺术之嬗变——以先秦时期玉器审美与功能特征为理路》、蔡青《后石家河文化玉器艺术的特征与源流考》与赫云《良渚玉器艺术的“介”字形冠研究》等。这些研究均为艺术院校的硕士或博士学位论文，代表了艺术史界对考古材料的回应与解读。然而，就目前来看，高质量且较为系统的玉器艺术与设计研究仍然较少。

考古学可以为艺术史、工艺美术史研究提供大量新材料，但它们之间的研究不可避免地也会有一定重合，如上文提到的玉器造型、材质与工艺研究。而且，越来越多的考古工作从材料和方法的层面为艺术史和设计史研究带来了较大的挑战和补充^[2]。以往，考古与艺术两学科之间，对彼此的研究范式与成果仅有少数人关注。同时，研究艺术史和工艺美术史的学者对于科技考古手段获取的信息和研究则极少运用。缺乏材质

[1] 田自秉. 工艺美术和美学 [J]. 装饰, 1987 (2): 3-4.

[2] 郑岩. 多相之维: 考古学与美术史的跨学科观察 [J]. 艺术学研究, 2020 (6): 15.

成分检测与分析、在高倍显微镜下观察工艺微痕的玉器工艺美术和美学研究，则是不完整的，也不够科学。因而，新时代的艺术史与工艺美术史研究已无法摆脱考古学的影响和补充，同时，一个全面完整的物质文化研究也应纳入艺术学的视角。

二、跨学科视角：从“器物本位”到“器物史料”

通过对几种不同玉器研究范式的回顾，可以清晰地发现不同范式已有研究的局限性。一方面，以往研究多只注重玉器本身，从“器物本位”出发，而从多个角度观察的用玉制度或用玉传统分析这一方面的研究仍有所欠缺。另一方面，以往的玉器研究多从某一学科角度出发，缺乏跨学科的综合性、交融性研究。故而，我们希望将玉器置于层层考古背景下，将玉器还原成“器物史料”，也只有这样古玉研究才能上升到一个新境界。同时，需要跨学科的研究思维、视角与方法，往往能够碰撞、融合出新成果，也对本学科的发展提出新的问题与挑战，并最终实现其扩展和提升。因而，需要通过把玉器作为一种“器物史料”，将玉器置于层层考古背景与社会情景之中，探求制度、技术、艺术、流通与精神信仰层面的知识。

具体来讲，本书的研究对象是以考古发掘和采集的龙山时代的玉器为主，如有必要，兼辅以著录的传世玉器。这里又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概念，即龙山时代。这是一个复杂、变化的概念，需要研究者根据研究需要与研究目的去界定与说明。“龙山时代”这一概念首次由严文明先生提出，是指与龙山文化同一时代并同龙山文化发生过不同程度联系的一些考古学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主要有豫北冀南的后岗二期文化、豫东的造律台类型、郑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陕西的客省庄二期文化、湖北桂花树三期文化、齐家文化早期等，其年代大体上在公元前

2600年—前2100年。^[1]之后，严文明先生又将龙山时代的时间范围扩展至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2]此后，关于龙山时代的概念就存在两种含义，广义的龙山时代包含庙底沟二期文化，时间跨度为1000年；狭义的龙山时代仅指与龙山文化大体同时的时期，时间跨度约为500年。然而，随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推进，新的年代学研究表明，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龙山时代，其绝对时间与严文明先生的定义并不相同。因而，本书主要采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年代学研究的新成果，广义的龙山时代年代在公元前2800年—前1800年，这一成果已反映于参与“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学者的相关论著中，如张海、陈建立关于史前青铜冶铸业与早期国家形成的研究。^[3]狭义的龙山时代的时间为公元前2300年—前1800年。

为了研究的连续性与广度，本研究采用的是广义的龙山时代概念，可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二者的分界线约在公元前2300年。从相对年代来说，龙山时代早期包括的考古学文化有：黄河上、中、下游分别为马家窑文化半山和马厂类型、菜园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和陶寺文化早期、大汶口文化晚期，长江中、下游分别为屈家岭文化晚期至石家河文化早期、良渚文化晚期；龙山时代晚期包含的考古学文化有：黄河上、中、下游分别为齐家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陶寺文化中晚期、王湾三期文化、后冈二期文化、客省庄文化、石峁文化）和龙山文化。其中需要说明的是，齐家文化的下限要晚于龙山时代的下限，但由于其主体部分仍处于龙山时代，因此本文仍将整个齐家文化纳入本文的讨论范围。

然而要界定龙山时代，还必然涉及夏文化探索的问题。目前，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已为学术界普遍接受。但是根据最新的测年研究成果，

[1] 严文明. 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 [J]. 文物, 1981(6): 41-48.

[2] 严文明. 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 [C]// 张学海. 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文集. 济南: 齐鲁书社, 1993: 39-45.

[3] 张海, 陈建立. 史前青铜冶铸业与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关系 [J]. 中原文物, 2013(1): 52-59.

由于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大约在公元前 1750 年—前 1530 年之间，存在时间仅 200 年，^[1] 不能与文献记载的夏朝纪年完全符合，因此，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充其量相当于夏代中晚期遗存^[2] 或晚期夏文化^[3]。而在此之前何为夏文化，目前学术界也基本认同“新砦期”遗存为介于龙山时期与二里头文化之间的过渡阶段，^[4] 李伯谦先生认为其为“太康失国”阶段的夏文化。^[5] 然而“新砦期”遗存的年代约为公元前 1830 年—前 1680 年，^[6] 即使加上“新砦期”遗存，考古学上的夏文化年代还是不能够完全涵盖文献中记载的夏代积年。新近比较系统的研究表明，夏王朝文化包含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包含“新砦期”在内）和二里头文化。^[7] 因此，本书夏代的积年采用考古学上的研究成果，这样龙山时期的下限就已经进入到夏代的纪年范围。而根据龙山时期众多考古学文化年代的研究成果，不同地区进入国家进程的时间并非同步，尤其周边地区较中原地区有所滞后。本文研究的一些玉器，如牙璋、牙璧之类的延续时间显然超越了龙山时代这一范围，因此，相关研究可能并不局限于这一时期，而有所延展。

东亚大陆的地理单元最显著的特征是从西向东横贯的两大河流——长江与黄河。而龙山时代的主要考古学文化与文明也主要集中在这两个大江、大河流域，同时文明开始跨越南岭，进入珠江流域。本书的空间

[1] 张雪莲，仇士华，等. 新砦—二里头—二里冈文化考古年代序列的建立与完善[J]. 考古, 2007(8): 74-89.

[2] 赵青春. 关于新砦期与二里头一期的若干问题[C]// 杜金鹏, 许宏.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 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279-303.

[3] 韩建业. 良渚、陶寺与二里头: 早期中国文明的演进之路[J]. 考古, 2010(11): 71-78.

[4] 凡是涉及早期夏文化探索的研究，基本都认为“新砦期”是一种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过渡的遗存，由于研究的学者众多，恕不一一列举，可参看许宏《“新砦”文化研究历程述评》和常怀颖《二里头文化一期研究初步》等文。

[5] 李伯谦. 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1: 2.

[6] 赵青春. 关于新砦期与二里头一期的若干问题[C]// 杜金鹏, 许宏. 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 中国·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6: 279-303.

[7] 孙庆伟. 鼎宅禹迹: 夏代信史的考古学重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 485-489.

范围主要围绕这几条大江、大河而展开。

明确了研究的内容、时间与空间范围，接下来在研究方法的加持下，从器类、造型、时间、地域、等级、性别、材质、工艺、审美等关键词汇入手，分别阐述不同区域龙山时代玉器的特点与特征。具体来说，需要从不同的微观层面入手。首先，结合以往研究与其他考古学材料，运用考古学分期方法，将龙山时代的用玉分为早期和晚期两个阶段。其次，综合运用考古学和设计学视角，分析龙山时代不同区域玉器的器类组合与造型特征。再次，主要运用考古学视角对各个区域考古学文化所见玉器及其考古学背景进行梳理，进而在不同层次的考古学背景中考察其分布情况。为了进一步观察不同种类的玉器在不同地区的使用情况，在综合以上特征和观念的基础上，对龙山时代所见的礼仪用玉、装饰用玉、丧葬用玉、工具用玉等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特征、等级特征、性别特征及地域特征进行分析与归纳。接下来，通过材质成分检测与工艺美学视角，分析各个区域玉器的材质、工艺、图案与美学特征。根据田自秉的工艺美学原则，玉器的工艺美学特征主要包括生活美、艺术美、科学美：“所谓生活美，是研究人们生活方式所形成的美的观念，研究民族的审美特点，研究生活发展中流行心理对美的追求，它包括人们的生活、思想、心理、品质、意趣以及习俗等内容。生活美是工艺美学的基础，也是工艺美学的内涵。所谓艺术美，是研究工艺美术的表现形式，例如形式法则，形式感等，它反映人们的智慧创造，是工艺美学中的主要方面。所谓科学美，是指在制作中的物质美、结构美、技巧美等内容。”^[1]由此可知，关于玉器的用玉制度研究，其实暗含了较多玉器生活美的内容。

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上，仍需从整体和宏观层面对龙山时代的用玉传统、工艺美术的嬗变进行把握。然而，这并不是研究的结束，本书希望通过对比龙山时代各个地区和各相关考古学文化用玉情况的详尽梳理和分析，以及与其他器物和埋藏位置的比较，在获知各个区域和考古学文化

[1] 田自秉. 工艺美术和美学 [J]. 装饰, 1987 (2): 4.

用玉特征、工艺传统的基础上，进而加以对比和进一步分析，以窥探龙山时代在国家整合形成过程中，玉器的流通与互动所反映出的族群和社会的变迁，以及玉器的礼制化所折射的龙山时代的社会体系。

总体而言，通过微观和宏观的考察与跨学科的融合分析，在理解和知晓龙山时代各用玉考古学文化的用玉特征与工艺美学特征之后，对一些重要的装饰用玉和玉礼器的变化、流通与使用进行剖析，从而达到透物见人、由物铸史之目的。

三、相关说明

由于相关概念与认识的分歧性，需对相关问题进行必要说明。

（一）玉器概念的说明

夏鼐先生曾指出，“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是指一切温润而有光泽的美石”，^[1]这一看法与东汉许慎之“玉，石之美者”的认识基本相同，长期以来这被认为是广义的玉概念。近现代根据矿物学的研究，把玉分为软玉（阳起石—透闪石）和硬玉（翡翠），而闻广先生又按照矿物学结构，把软玉和硬玉归为真玉，而其他美石则归为假玉，^[2]真玉则为狭义的玉的概念。现代矿物学赋予玉的定义固然有其科学的一面，然而毕竟中国古代对于玉的定义不是从这一认识出发的，因此中国古代玉石的涵盖范围也就绝不会仅是真玉。而在周代用玉与否、用玉与用石的多少本身就是一种等级差别的表现，^[3]在周代已经有了从事“相玉”的专业人士——玉人，^[4]积累了辨别玉石的某些标准，而龙山时期古人对玉的认识或许还不

[1] 夏鼐. 有关安阳殷墟玉器的几个问题 [M]//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玉器.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1-7.

[2] 闻广, 荆志淳. 沔西西周玉器地质考古学研究 [J]. 考古学报, 1993 (2): 251-280.

[3] 孙庆伟. 周代用玉制度研究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7.

[4] 孙庆伟. 从《说文·玉部》看先秦两汉时期的相玉 [C]// 孙庆伟. 礼以玉成: 早期玉器与用玉制度研究.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15-23.

如周人准确，这就更增加了玉的概念的模糊性和其涵盖玉与其他美石的多元性。据龙山时代考古发现，也确实如此，在古人眼中，玉不仅限于矿物学上的真玉（主要指软玉，硬玉在明清时期才多加利用），而是包含了绿松石、蛇纹石、玛瑙、玉髓、水晶、大理岩等其他美石。

本书以探讨龙山时代的用玉传统和工艺美学为目的，而墓葬和遗址中是否出土玉器，墓葬中玉器与石器的多少，以及与其他相关器物的关系，都有助于对这一时期用玉传统和用玉观念的研究，因此本文所讨论的对象除了广义上的玉，如有必要还包括相关的石器。

（二）玉器名称的说明

对于如何为出土玉器定名，夏鼐先生曾指出：“充分利用现已由考古发掘所累积的大量资料。我们的出发点是发掘工作中出土的玉器，然后再参考传世品和文献。可以定名的，即用古名，如果古名找不到，可以取一个通俗易懂的新名。用途不能确定的，可以暂且存疑，不作决定。”孙庆伟已经指出这种方法在实际运用中的局限性。因此，学界对玉器的命名依然较为混乱。^[1]由于史前并无相关文献记载，然而考古出土玉器的定名随着不同考古工作者的认识差别而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如玉钺，有些报告中就称为玉铲。因此，需要对一些名称不统一但又较为重要的玉器名称进行说明，如璧、瑗、环，钺与铲，牙璧等。否则，本文的统计将有失偏颇，而由此形成的认识与结论也未免有所偏差。对各类命名争议较大器类的定名既需要梳理以往称呼，又需要给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名称，并说明原由，因此，对各类器物的定名将放置于本文的相关章节中。

（三）玉器种类的划分

玉器种类的划分更多侧重于其功能，虽然龙山时代没有文献记载，但是与之后的三代文明一脉相承、息息相关，一些器类从龙山时期一直

[1] 孙庆伟. 周代用玉制度研究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8.

流传至夏商周三代，在服饰用玉、瑞玉和丧葬用玉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因此，一方面相关文献记载依然是本书对龙山时代玉器种类进行划分的依据，但是需要辩证地看待。然而某种玉器可能兼具多种功能，因此，另一方面本书更多地根据玉器出土时的位置与状态来判断其功能，进而将其归类。根据前期玉器资料的梳理，依据上述标准可将龙山时代玉器分为礼仪用玉、装饰用玉、丧葬用玉和工具用玉等四大类，需要说明的是那些出土数量少、没有使用制度与特点可循的玉器，不在相关章节的讨论之列。

（四）用玉制度的说明

虽然龙山时代处于中国国家诞生的前夕，但是此时黄河和长江流域上、中、下游的考古学文化面貌差异依然较大，即使是二里头文化时期，仍未实现文化面貌和政治版图统一，甘青地区齐家文化依旧延续，下游地区岳石文化兴起。因此，这种状况就导致必然不存在统一的用玉规范。固然此时一些玉器已经被赋予礼制的含义，然而这种礼器的使用在当时而言仍未形成一套严格而有效的精准方法。因此，本文所谓的“用玉制度”是指龙山时代用玉的一般情况和特征，包括等级特征、性别特征、使用方式、器类构成、地域特征等方面。

（五）墓葬等级的划分

墓葬等级的划分历来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尤其是史前时期，更没有统一的划分标准，或者说被大部分学者认同或接受的精细方法。中国的学者对史前墓葬等级的划分大多没有具体标准，也就是没有“定量”，往往多是“定性”，但并没有经过论证。然而国外学者的划分虽然往往采用“定量”的方法，给出具体的数据，但是其划分也存在问题，秦岭^[1]

[1] 秦岭. 类型价值 (TYPE VALUE) 与墓葬价值 (GRAVE VALUE): 介绍墓葬研究中的一种量化方法 [J]. 华夏考古, 2007 (3): 133-137.

和彭鹏^[1]两位学者专门对西方学者的一些方法进行了介绍、评介和相应的改进，但并没有实例操作与证明。“国内外很多学者普遍认为，墓葬是死者社会地位和社会势力范围的反映，因此墓葬可以被理解成是社会行为的扩充，是社会组织的一种表现形式。”^[2]这就表明墓葬的规格肯定存在等级。由于本文的重点不是讨论如何划分墓葬等级并提出或改进一种新的、有效的方法，而西方学者的方法过于细琐与费时费力，故而本文依然采用分析墓葬规模和随葬品组合作为衡量墓葬等级和社会复杂化的主要标准，这也是大部分学者通常的做法。

但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龙山时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与文化主体，采用单一方法可能并不能通行。如齐家文化墓葬中有较多合葬墓，其埋葬方式与龙山时期的其他地区差别很大，因此每个地区的划分标准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比较时只能大体上说某一考古学文化的某一等级墓葬相当于另一考古学文化某一等级的墓葬。由于龙山时期社会的不统一性，因此，关于墓葬等级具体的划分标准在讨论该地区或该考古学文化时，再作说明。

（六）关于地理名词的说明

本书在行文中有时会出现甘青地区、中原地区、海岱地区、江汉地区等地理名词，大体对应本书中的黄河上、中、下游和长江中游地区。其中中原地区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原主要指河南省大部及与晋、陕交界处。广义的中原地区则指黄河中游及其附近的广大地区，包括河南全境、关中东部、山西和河北南部地区。本文的中原地区指广义上的中原地区。

[1] 彭鹏. 墓葬等级分析中一种量化方法的思考：以大甸子墓地为例 [C]//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55-71.

[2] 秦岭. 类型价值（TYPE VALUE）与墓葬价值（GRAVE VALUE）：介绍墓葬研究中的一种量化方法 [J]. 华夏考古，2007（3）：133.

